经济日报 ECONOMIC DAILY

以财政货币政策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 闫坤 汪川

观察者说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更好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更好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此，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需与新的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一方面，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稳定器作用，提升政策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另一方面，推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提质增效，避免大收大放的调控方式，更多致力于提升经济效率和补足民生短板，营造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

具体来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需在以下几个方面切实发力。

第一，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注重结构调整。

就目前经济形势看，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与外部风险相叠加，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为更好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我们短期内需要以积极的财政政策保障经济平稳健康运行，可考虑适度提高地方政府专项债规模，适度提高财政赤字率目标，扩大积极财政政策的政策空间。

同时，要更多聚焦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推动产业升级。财政政策需重点支持具有示范效应的先进制造、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持续激发内需活力。从我国目前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来看，工业领域和基础设施投资空间还很大，可立足于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在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大数据中心等领域切实发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还要看到，通过减税减轻企业税收负担，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要方面。目前，已有的减税降费措施取得了较好的政策效果，未来可以考虑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和增值税税率，提高企业的获得感，刺激企业扩大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提升生产能力。同时要健全支持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适度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增强企业家进行投资的愿望和信心。

此外，需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可考虑进一步加大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等民生领域的支出，加大对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和创新的支持力度。

第二，深化金融改革，保持货币政策灵活适度。

货币政策方面，需增强货币政策的灵活性，注重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可以利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同时促进信贷结构优化，引导银行加大对民营企业、制造业中长期贷款的支持力度，并加大对疫情防控的关键领域及受疫情影响严重地区的信贷支持力度。在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方面，可以通过下调中期借贷便利（MLF）等政策利率，引导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下行，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并加快推进金融机构资本补充，提高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与此同时，需完善市场利率形成机制，提升货币政策传导的有效性。目前，我国利率市场化已基本完成，银行间市场日益成为金融机构拆借资金的主要渠道。鉴于此，我国的货币政策调控应朝着更加市场化的方向发展，以市场化手段进行货币政策调控。为此，应进一步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定价机制，根据宏观调控政策的需求，重点引导中小企业贷款、“三农”贷款参考LPR定价，以达成结构性降息的效果。

第三，不断优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调控方式。

我国经济增速进入换挡期，同时还面临经济结构优化的任务，对此，要不断优化宏观调控方式，更好适应当前经济环境，着力改善结构性失衡问题。

一是明确宏观调控的政策边界。目前，我国宏观调控的范畴比较宽泛，在职能设置上存在宏观调控与行政审批等职能交织的情况，有可能会造成宏观调控措施手段越界。因此，应该进一步明确宏观调控的职能范畴。

二是优化宏观调控目标。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其宏观调控转型大多经历了一个由“多目标调控”向“突出物价稳定目标调控”的转变过程。我国目前尚不具备强调单一目标调控的条件，但宏观调控的多目标现状，也容易造成政策信号混乱和市场预期不稳。未来，宏观调控可考虑更加突出物价稳定和经济结构调整的目标。

三是政策目标需锚定中长期。宏观调控的目的是使经济周期更为平稳，避免较大的经济波动。因此，在负面冲击较为严重的情况下，严格实现经济增长的年度目标不仅成本较高，且偏离了熨平经济周期的初衷。因此，可考虑更多关注在中长周期内实现宏观调控目标，增强宏观调控的政策权衡空间。

第四，有效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性。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在财政政策方面，需通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形成支撑；在货币政策方面，需更加审慎，避免总需求波动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为高质量发展培育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

在政策分工方面，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应分别针对总量和结构目标发力。就政策工具的属性来看，货币政策偏重总量调控，而财政政策则兼具总量和结构调控功能。因此，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性，需要进一步区分二者的角色：货币政策应更多地承担总量调控的任务，主要作用于总需求；财政政策则需在总体宽松的同时，更关注通过结构性调控影响总供给，实现供给质量的提升。就当前经济环境而言，保增长的积极财政政策不仅要立足于财政支出的规模扩张，还要在保持适度财政收入增长的情况下，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社会公共产品的支出，保障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在稳增长的同时实现产业优化升级和经济效率的提升。

有效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性，需构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制定部门的日常协调沟通机制并有效防范风险。在沟通机制方面，应进一步加强促进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的体制机制建设，增强政策制定程序和具体措施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并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加强与公众沟通。在防范风险方面，特别要重视地方财政风险，建立财政风险监控与预警机制，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风险预警指标体系，重点关注地方政府当年债务偿还情况、债务余额、偿债能力和债务风险指标等。

总而言之，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对做好宏观调控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对此，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在发挥稳定器作用的同时，更加注重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不断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民生服务水平，保障我国经济健康平稳运行。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他山之石

日本制造业发展的主要经验及其启示

□ 周毅 许召元 李燕

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指以增强创新能力为核心，以产品质量、标准和服务提升为主要标志，最终形成产品具有国际竞争力、企业具有世界影响力、产业具有全球整合力的总体格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劳动力成本上升、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问题、人口老龄化、消费升级等各种挑战，迫切要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在此背景下，可借鉴日本制造业发展的有益经验，为我国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一）

总体来看，日本制造业发展情况较为稳定。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日本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保持在19%至21%之间。在先进制造业出口方面，2008年至2017年，高科技产品出口额占制成品出口额的比重，除了在2009年出现短暂上扬外，基本呈下行走势。

从总量数据来看，日本制造业的表现并不抢眼，但日本制造业企业注重长期的传承和持续创新，在先进制造业领域的实力较强。入围全球百强制造业企业的日本企业超过了40家，日本企业在产业上游的原料和设备领域，无论是专利的质量还是数量都非常突出。此外，因技术、解决方案、管理经验和客户关系等可以在不同领域间相互赋能，能够发挥“1+1>2”的优势，日本制造业还表现出了平台化的发展趋势。

日本在推动制造业发展中的经验，可为我国提供借鉴：一是高度重视产品质量，日本企业普遍认为产品质量是企业的生命线；二是重视基础技术和创新发展，特别是大企业更加注重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双轮驱动；三是重视国际化运营管理能力，日本企业往往会走国际化发展的道路；四是重视上下游协同发展，日本上中下游企业一般能组成完备的产业链，实现共同促进、利益均沾、共赢发展；五是在促进产业发展的过程中，能有效发挥政府和中介服务组织的作用，这极大降低了日本中小企业海外发展的风险。

（二）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国制造业取得长足发展，“中国制造”享誉全球，通信网络、高速铁路、风电光伏、建筑机械等行业设备远销海外，在数字经济领域的模式创新也走在国际前列。但与日本等制造强国相比，我国制造业发展还存在较大差距。具体表现为：制造业未形成合理的市场结构，很多产业存在大量“零、小、散”企业，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工业基础能力相对薄弱，我国零部件领域的基础能力和工艺水平都存在短板，进而影响到高端装备、机床、汽车、集成电路等产业的更好发展；产业上下游企业的协同性不足，难以发挥出协同优势。

我国制造业在某些领域发展质量不高，是多重因素导致的，特别是现实存在的后发劣势值得关注。一是在技术方面，制造业技术不是颠覆性技术，更多需要依靠长期积累而形成，我国相当一部分制造业企业积累太少，研发能力较弱，难以进入高端市场。二是在成本方面，先进入市场的企业往往规模很大，成本也因规模效应而大幅降低，相比之下，后进入市场的企业规模较小，具有成本上的劣势，很难争取到足够多的市场份额。三是在上下游协同发展方面，我国企业上下游配套协同发展的环境较为欠缺，又因技术相对落后、成本高昂等很难融入国际产业链。四是在市场方面，有的产业某些环节的市场规模较小，只能容纳少数几家企业，在后发企业进入市场前，市场基本上已被先发者占领，因而后发企业被消费者或产业链上下游其他环节接受的难度很大，在开拓市场时存在相当大的阻力。

（三）

推动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需多措并举，使存在后发劣势的领域加速脱离“低水平重复陷阱”，推动这些领域不断精进，加强对产业链中附加值高和技术含量高的关键环节的控制能力。具体来看，可在以下几方面发力：

一是鼓励企业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提高技术创新能力。需平衡好国产化与全球化的关系，利用我国强大的市场优势，在高铁设备、通信装备整机等高端装备领域取得突破，继续鼓励代工企业加大研发力度和自建品牌，同时加强与国外单项冠军小企业（规模小、技术好但市场份额有限的企业）的合作，实现共赢。

二是培育重视质量的环境和精神。倡导工匠精神，引导企业更专注于技术提升，不断积累和改进；做好质量建设工作，完善质量认证体系和质量管理体制，高度重视通过质量控制体系、精益制造等理念提升质量管理的能力；继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提高维权效率和侵权成本；积极探索制造业企业员工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引导优秀人才流向制造业。

三是形成大中小企业协作发展的良好环境。不断完善我国中小企业政策体系，加强对创造性活动的扶持，确保中小企业的经营资源。一方面，需完善有利于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支持大中小企业和各类主体融通创新，鼓励上下游之间国产化配套；另一方面，要维持良好的行业秩序，切实保护各类企业在商业运营方面的利益，打击不正当竞争。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理论之声

推动网络扶贫需协同发力

□ 马玉娜

随着数字信息技术快速发展，我国网民数量急剧增长，产业数字化快速推进，数字化消费蓬勃发展，网络扶贫亦呈现出新的发展局面。在今年召开的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利用互联网拓宽销售渠道，多渠道解决农产品卖难问题”，这为我们更好推动网络扶贫指明了方向。

网络扶贫以数字技术赋能、引领贫困地区产业发展，为贫困群众提供了自主脱贫的新手段、开辟了增收新空间。实践表明，充分发挥网络扶贫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中的重要作用，需坚持动员全社会参与，促进多元主体协同发力，构建政府、社会、市场协同推进的网络扶贫格局。

网络扶贫是大扶贫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一种扶贫新手段，互联网信息技术已深入到扶贫工作的方方面面，有力促进了扶贫对象的精准识别、扶贫动力的内外融通、扶贫效果的可持续。

一方面，通过互联网技术广泛应用，扶贫信息急剧增长且数量庞大，信息传播呈现出时间上的即时性和空间上的广泛性，扶贫产品与服务的规模化发展、集约化经营和市场化竞争得以顺利推进，扶贫产品与服务供求双方的交易便捷性和互动性得以有效提升，扶贫工作日益向纵深化发展。

另一方面，互联网信息技术以其特有优势，塑造了新型的生活环境，催生了全新的扶贫手段。2020年《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网民规模达9.04亿，农村网民规模为2.55亿。互联网与扶贫工作相结合，为农村贫困群众开辟了参与经济社会生活的新渠道，催生了贫困地区农产品销售的新空间，推动了贫困地区与社会力量对接，使产业、技术、产品、服务等各种资源在贫困地区更好落地。

总而言之，通过网络扶贫，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可以通过劳动生产实现稳定增收，社会资源亦可以通过精准匹配实现供需对接。

重视网络扶贫的短板弱项

近年来，我国积极推动网络扶贫，取得显著成效，建立起了网络扶贫信息服务体系，实现了网络覆盖、信息覆盖、服务覆盖。但也要看到，网络扶贫的“协同力”依然不足，这成为制约网络扶贫发挥更大作用的重要因素。

以互联网信息技术为基础，网络扶贫中的“协同力”不仅体现为网络平台上供求双方及中间服务商之间协作而产生的合力，更体现为不同应用系统之间、人与信息系统之间等全方位协同而形成的合力。良好的“协同力”，能使个体获益、整体加强，产生事半功倍的扶贫效果。在现阶段的网络扶贫实践中，各方主体尚未形成机制完善、制度合理的协同运行关系，影响了网络扶贫的工作效率和整体功能的发挥。

有些政府部门尚缺乏网络扶贫运作的意识和能力。在意识层面上，各地往往重视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却对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扶贫优势缺乏了解，也缺乏对网络平台和社会公众利用网络开展扶贫活动意识的加强和引导。在能力层面上，各地一般缺乏与网络扶贫工作相关的战略规划、目标引导、组织协调、政策制定和人才储备，难以有效利用互联网技术开展扶贫工作。

部分互联网企业亦缺乏扶贫工作的组织能力和平台。目前农村电商市场上的主要网络平台，在架构设置、内容板块、技术应用、人员配置等方面缺乏扶贫工作方面的配套，在扶贫组织动员上存在公信力不足、组织化路径缺乏等短板，这导致互联网企业开展扶贫工作的能力不足。此外，不同网络平台之间，以及网络平台与贫困地区、贫困户、当地企业之间，缺乏交流沟通的平台，这也导致互联网资源分散、各主体之间市场信息不对称。

此外，贫困群众普遍缺乏网络运营能力和网络对接渠道，导致贫困群众在利用互联网技术开展创业就业时面临诸多挑战；社会公众缺乏网络扶贫的主观意识和参与渠道，导致出现网络扶贫产品和服务在市场上供求不平衡的现象。

多措并举凝聚网络扶贫合力

充分发挥互联网在助力脱贫攻坚中的重要作用，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需以政府、市场、社会间的新型协作关系为基础，科学界定各行为主体的职能，创新互联网时代的社会扶贫参与机制，提升互联网时代的贫困治理能力。

一是加强主管部门责任。制定相关优惠政策、法律法规、社会保障制度等，引领互联网企业参与贫困地区的产业扶贫项目；搭建网络扶贫的政策服务平台，建立信息资源整合机制、数据共享机制、信息沟通机制，助推各方主体遵守工作规范；与互联网企业和社会组织合作开展智力扶贫，提升基层扶贫工作者和互联网工作者的网络扶贫能力，以及扶贫对象的网络运营能力。

二是鼓励互联网企业持续创新。鼓励企业充分利用信息技术优势，依托互联网信息平台，聚集多元主体，开展协同扶贫的创新实践。主要是鼓励互联网企业在架构设置、内容板块、技术应用、人员配置等方面加强对扶贫工作的配套；探索“互联网平台+政府+龙头企业（合作社）+贫困户”等多元化合作扶贫模式；探索多元化产品营销模式，推动贫困地区农产品和文旅产品的网络营销模式升级，持续带动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三是激发贫困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信息技术优势，重点培育农村网络扶贫带头人，包括贫困地区的扶贫工作者、贫困户、志愿者等，以点带面，充分调动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鼓励贫困群众充分参与网络扶贫的生产、传播、销售等各个环节，充分发挥贫困群众的主体作用，增强他们利用互联网脱贫增收的意识和能力。

四是开辟社会公众参与渠道。通过线上线下融合的方式，使网络扶贫活动引发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同时开辟多元化的社会参与渠道，广泛动员社会公众在网络平台上参与扶贫活动，实现社会公众参与网络扶贫常态化。

（作者系共青团中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撷英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李晓华 提出：

把握新型基础设施新特征

新型基础设施的“新”是相对于传统基础设施而言的。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全球范围兴起，其核心驱动力是以新一代信息技术或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簇群。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信息网络、5G网络、数据中心等，继交通、能源、通信、水利等传统基础设施之后，成为广泛的经济、社会活动开展的基础。可以认为，新型基础设施是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形成的，是经济生产、居民生活、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开展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包括设备设施、算法代码、软件系统、标准规则等。

需要注意的是，新型基础设施呈现出不同于传统基础设施的一系列特征：

第一，以数字技术为核心。交通、能源、市政、社会等领域的传统基础设施主要以机器设备、建筑、设施为主，其中虽然也有数字技术产品或服务的投入，但都规模不大、占比相对较低。新型基础设施的核心支撑技术是数字技术，是数字技术形成的产品或服务。从产业分类的角度来看，作为新型基础设施的投入品，其虽然也有部分属于机器设备或建筑物，但主要属于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软件业、通信业、互联网和信息服务业；从产出的角度来看，新型基础设施提供的是数据采集、存储、传输、处理以及各种软件应用服务，也属于软件业、通信业、互联网和信息服务业。

第二，以新兴领域为主体。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传统基础设施的主体架构已经完成。随着我国基础设施逐步完善，传统基础设施的收益不断递减，其主要建设任务是查漏补缺和改造升级，新兴领域将成为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这同样也是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领域。

第三，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交通、能源等传统基础设施建设运营中使用的技术较为成熟，以增量型、渐进式创新为主，因此传统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和质量主要取决于投资的规模。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运营中投入的主要技术具有先导性，而且颠覆性创新不断涌现，其发展水平和质量不仅取决于投资规模，而且受制于科技创新的进展。科技创新的颠覆性越强，新技术工程化和产业化的速度越快，就会有越多的新技术获得应用，新型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也就越高。

第四，以虚拟产品为主要形态。传统基础设施虽然也包括规则、规范等，但主要是以物质产品的形态存在。物质产品是人类社会运行的基础条件，新型基础设施同样需要以物质产品为载体，但呈现出软硬结合、虚实结合的特征。在新型基础设施的硬件架构中还运行着各种软件、APP，包含着海量的代码、算法、数据，并且遵守行业共同的技术规范和技术标准，这些都更多地体现为虚拟形态。

第五，以平台为主要载体。传统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通信、电力基础设施具有典型的网络特征，众多的社会经济活动主体成为网络的末端节点。在经济社会活动中，公路、铁路、光缆、电线主要起通道的作用。连接以及数据的传输对于数字经济非常关键，因此仍然需要物联网、5G等具有泛在连接、通道作用的网络型基础设施。但随着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数据的存储、清洗、处理、应用的重要性大大提升，数据中心、云计算中心、工业互联网等基础设施成为提供数据、算法、算力的平台，大型商业化平台企业也成为大量中小企业开展业务的基础。由此，新型基础设施以平台为主要载体的特征凸显。

（肖伟）

本版编辑 栾笑语